馮敬恩大話連篇毫無誠信

焦點熱議 王剛

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亦是港大「罷課委員會」的成員，個人誠信早被公衆質疑。繼早前故意泄漏校委會保密內容後，前晚港大校委會開會時，再被指責「說一套做一套」。先是在會內投票支持校方建議，但同時又向會場外發放嚴重誤導性消息，直接導致了前晚極度混亂的場面。一個自命爭取「民主」的學生代表大話連篇，事實上正是以自己的言行表現去向市民證明，眼下鬧事的「罷委會」是怎樣的一群人。

港大「罷委會」前晚再次發動圍堵校委會的衝擊事件，當中出現的暴力、極端行爲，引起公衆的強烈的不滿，警方重案組亦已因應事件介入調查。雖然目前仍無法查清所有事情，但從昨日流出來的各種消息顯示，這像是一宗有計劃的預謀事件，而當中起着決定性作用的不是別人，正是早有「前科」的馮敬恩所「導演」的。

事實上，多名港大校委昨日接受訪問時都「暗示」，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可能是「罪魁禍首」。例如，校委文灼非指當晚會議原本正常，但馮敬恩在會議期間不斷用手機發放訊息，很可能因此激發了學生作出衝擊行爲，「即係佢一路開會一路做緊嘢，主席都叫佢唔好咁做」、「照計學生唔會咁激動，入嚟攔截停車場唔畀人走」，文灼非對此感到奇怪，更言「難得一次可以一致通過決議。」

另一名校委陳祖爲在接受訪問時亦指出，學生不滿意校委會的決定，認爲校委會沒有制定成立專責小組的時間表，亦對小組的組成有意見，但他指學生可以再約見李國章商討，「睇唔到校方點解會唔見」。他又指，若校方拖延成立小組，作爲民選教職員代表亦不會同意。

這些校委的意見都在顯示，會議內「正常」、會議後又突然「生變」，當中顯然是有人在故意「搞鬼」。而根據紀錄，馮敬恩當晚曾投票支持校委會的決定。當中虛僞之處在於：爲什麼一邊可以投票支持、另一邊又傳遞虛假的消息？如果馮敬恩不滿校委會決定，大可在會上提出來，如此「說一套做一套」的行爲，難道就是學生會的操守？

此次事件已非簡單的學生示威，而是演變成了刑事違法成分，尤其在於，前晚有人公然採取行動阻止警方前往執法，這是在挑戰香港的法治、挑戰香港社會對違法行爲的容忍度。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能果斷採取回應措施。他昨日向全體師生、舊生等發出電郵，譴責部分學生堵塞通道阻止校委離開，指出學生將校委，他自己以及保安等人身安全致於嚴重危險當中。並批評，學生手段完全沒有必要，無助對事件取得任何進展，「我們會永遠願意作理性的討論，並與同學辯論，但我們不能縱容暴民（mob）統治。」馬斐森在電郵中提到，校方已把昨晚現場片段錄影下來，並會提供予警方。這一表態，已經顯示了整個港大對此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也不會繼續姑息下去。

「罷委會」儘管打着「罷課」的名義、叫着「奪回港大自主權」的口號，但卻無法掩蓋前晚這種嚴重的暴力極端行爲。而整件事中馮敬恩的表現，無疑是在證明自己「大話連篇」，也是與其個人一貫以來視誠信於無物的又一體現。如果香港由這種人把持下去，如何能有將來？如果其政治訴求得到滿足，那麼市民眞不知道下一步又會生出何種亂象來。

古語云：「食言多也，能無肥乎？」馮敬恩已經成爲了家長教育子女「勿說謊」的反面教材！

▲港大前晚發生的暴力衝擊事件，馮敬恩起着關鍵的煽惑作用 資料圖片

圍堵校委 意在奪權

港事港心 方靖之

港大校委會日前開會，是李國章首次以校委會主席身份主持會議。一小撮激進學生以及學聯人士，早已揚言會再發動圍堵校委會行動。最終，校委會雖然回應其訴求、一致通過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大學條例》，但他們仍不滿足，竟然發難衝擊會場大樓，再一次上演圍堵校委的鬧劇。這一小撮激進學生，接連在大學校園發動違法衝擊、非法禁錮，不但視法律如無物，更將「明德格物」校訓和尊師重道精神棄之不顧，顯示這些學生已經被激進派「洗腦」，變成激進派的爛頭蟀。其實，他們的訴求校委會已經回應，但他們依然堅持發動衝擊，說明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於所謂檢討《香港大學條例》，而是要奪取大學管理權。他們這些行爲，才是眞正侵害大學的校務自主。

去年7月28日晚，港大校委會審議副校長任命事宜，已發生過部分港大學生會成員包圍衝擊會場的事件，有校委在混亂中受傷不適。學生的粗暴行徑引起社會各界猛烈抨擊，更成爲港大校史的黑暗一頁。然而，他們卻沒有反省教訓，仍然再次發動違法衝擊行動，不但再一次傷害港大，更是公然踐踏法律。執法部門應該對搞事學生採取執法行動，港大也應對犯事學生處以校規，不能讓一小撮目無法紀的學生，三番四次的傷害港大，衝擊法治。更不能讓外界產生一個錯覺，就是學生犯法，就可以不必承擔法律責任。

大學校園是求學問、講道理的地方，這一小撮學生毫無「明德格物」的精神，對於不滿意的人事安排動輒採取暴力手段處理，拒絕講道理，行徑猶如流氓。在當晚，新任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及部分校委，在會議結束後被重重包圍，不能離開大學，形同遭受「變相禁錮」；校委紀文鳳遭學生包圍近一小時未能離開，報警表示頭暈，當救護員趕至接離現場，竟然不獲學生放行。在港大這所百年高等學府，一小撮學生目空一切，蠻不講理，毫道人性的表現，實在令人震驚心寒。

校委會作爲港大最高權力機構，校委會的自主就是代表港大的自主。而校委能夠在獨立、安全、自主的環境下就校政作出決定，不受政治勢力的介入干預，就是大學自主的最佳體現。但現在一個情況，就是校委會不時遭到激進學生的干擾、威脅、衝擊，完全不能在安全環境下作出決定，甚至當校委會已經回應了學生訴求後，仍然遭到學生的圍堵。這說明一小撮學生根本不是爲了爭取什麼，而是要令校委會完全聽命於他們。他們要任用陳文敏，就要任用陳文敏；他們要廢除特首做校監，就要廢除特首做校監；**惟有校委會聽命於這班「紅衛兵」，才可以免除暴力衝擊，這是赤裸裸地暴力奪權。所以，不論什麼人出任校委會主席、不論校委會作出任何符合港大利益政策，他們都要反對、衝擊。玄機正在於此。**

向反對派的任性大聲說「不」

議論風生 崔寧

「任性」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對香港反對派所作所爲用的形容詞，他在日前新春酒會致辭時說：對那些任性地耽誤香港發展的現象，大家都要站出來大聲說「不」。相信，選用這個似乎有些中性的形容詞，並不是迎新賀辭要營造和諧歡樂氣氛，相反，是恰到好處地點到了反對派政客井底之蛙的眼界、緣木求魚的心態和自以爲是的作派，將他們非理性、不守法和不負責任的所作所爲生動地揭示出來。

張曉明主任在致辭中以「登高望遠，共謀發展」爲主題，讚頌國家在過去一年各方面取得的驕人成就，介紹未來實施「十三五」規劃，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希望大家從國家發展的全局和高度，來看待香港社會未來發展，在「一國兩制」實踐中，齊心協力，共謀發展。國家發展成就斐然，新的機遇充分展現，香港要發展，就要着力提升經濟競爭力，就要善於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借力國家發展大勢，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然而，在這樣一個迫切需要發展的大背景下，香港反對派政客又都做了些什麼呢？

非理性抗爭製造社會混亂

先不提遠的。就在張曉明主任致辭的時候，在立法會，政府提出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被「拉布」「流會」「點名」阻撓；高鐵「一地兩檢」設計和政府向港珠澳大橋建設撥款的計劃正在遭受質疑和反對；在百年名校港大，反對派政客在背後操弄的「罷課」，一群激進的學生又圍堵衝擊校委會。種種的激進行爲，究竟爲了什麼，是爲港大好嗎？是在爲香港着想嗎？是在推動未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趨勢嗎？完全不是。所謂任性，首先就是缺乏客觀公正態度，就是非理性。理性是維持一個社會正常運作的必要條件，也是一個政黨團體存在和延續的關鍵，香港未來的發展需要社會更多的理性，而非相反。

張曉明主任在致辭中提出香港發展「三個要點」，其中首要是始終堅定「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在「一國兩制」實踐上，中央強調「不會變、不動搖」，也強調「不走樣、不變形」，就是要求香港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要堅持依法辦事，要完整準確地理解並落實基本法。反對派政客在許多問題上卻與中央的期待背道而馳。在這方面，他們的「任性」集中體現在違背基本法的規定，把香港視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否定中央的管治權，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甚至鼓吹「港獨」。這種不依法辦事，不願在基本法軌道上推動香港各項發展的行爲，在過往的政改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香港社會發生「佔中」的教訓深刻，現階段正是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期，社會需要化解戾氣，及早回到「一國兩制」正確軌道，不可再「跑偏」。

違背基本法偏離發展軌道

反對派政客的「任性」，在於他們自以爲是，以爲提出的那一套有點洋氣和時髦的理念和追求手段至高無尚，完全不顧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史和客觀現實，不顧香港的憲制地位，不顧法律制度的規範性和嚴肅性。這樣做的結果如何，時間已經將答案告訴給每一個香港市民。

反對派政客的「任性」，除了非理性、不守法，還在於從來不考慮他們這樣做的後果。現在看來，他們並未汲取「佔中」失敗的教訓，在政府將工作重心轉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後，依然故我，在「倒梁」旗號下，不停頓地阻擾政府順利施政。如此這般折騰下去，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策略的落實，香港社會長期積累的房屋、土地和貧富分化矛盾的緩解，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的保持，以及在國家「十三五」規劃及「一帶一路」戰略發展中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願望的實現，這一切就會舉步維艱，要實現就會困難重重。反對派政客的「任性」，香港社會的內耗，已經讓香港輸得很慘，市民大衆不會允許這種現象繼續下去，消耗掉香港賴以發展的動力和令人珍惜的時光。

促進經濟民生化解矛盾

特區政府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解決香港社會各種複雜矛盾的關鍵，正如張曉明主任在致辭中說「這些問題的根本解決，從根本上來說都要落實到財政能力上。財政能力從何而來？只能是從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上來」。

香港的發展時不我待，在新的一年，一個齊心協力謀發展的社會氛圍十分重要。對於那些任性地耽誤香港發展的現象，大家都要站出來說「不」，才能有效阻嚇那些有損於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損害香港市民切身利益、損害「一國兩制」實踐的事接連出現。反對派政客也只有在這吶喊聲中幡然醒悟，丟棄「任性」，回歸理性、法制，認眞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才能成爲社會正能量，而不是變成香港發展的逆流，「一國兩制」實踐的絆腳石。

反對派喉舌助長「政治嚴寒」

有話要說 荃葵

早前一個時事論壇，討論由天氣反常變得嚴寒，說到環保減排，當中的互爲因果。只見一反往日常態，台上台下沒有多少人作政治爭拗，儘管仍有零星無事生非的激進反對派中人在台下叫囂，離題萬丈，亂套「政府應多關注減排，好過參與『一帶一路』」。

值此政治化的香港，該時事論壇不談政治而去談減排，論題定得少有的好。由此令人想到，政治化了的香港，媒體其中一個重大使命，是淡化社會爭拗，應在兩邊爭拗主角中擔當調停角色。辦論壇，不必跟着爭拗者一律講政治，令政治化更政治化。

反對派喉舌報或電子傳媒，從不理會社會責任良心，一向認爲「教育大衆於我何干」，炒作爭議只爲爭取高收視率或多「銷紙」。其實，辦時事論壇，並不在於政府是對或錯，而應協助社會的政治過熱降溫。社會正在撕裂之際，你還來不斷落井下石，不斷以無聊問題質問當事人，唯恐問題不尖銳；這樣只會讓事件發酵再發酵，以至發霉再發霉，令社會更加撕裂。社會民生大事多的是，不愁沒有話題，爲何非要咬住政治化事件不放呢？一味罵政府，猶如不斷棒打一個爲你做事的人，而且「打死罷就」，不讓他歇息，無半點包容，對社會又有什麼好處呢？

反對派喉舌中的記者、時事節目主持人，習慣了對建制無限針對做法，目的是想激怒當事人，讓他們在鏡頭面前出醜。

把外地新聞拿來與香港作比較，引導市民如何分析問題，也是記者應盡的責任。例如台灣「大選」剛完結，綠營領袖蔡英文當選「總統」。今天的台灣，已不再是「非藍即綠」，不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是以往沒有中間協調路線的亂局。如果眞能逐步「藍加綠」，彼此願意坐下來多商量，那是「彩虹」初現了。其他如泰國、緬甸的議會、中東的社會近況、歐美的局勢等等，也可以由遠及近，帶領港人從人家的經歷中學習，明白眞正的民主離不開理性協商。本港的記者們，爲何不這樣做呢？

反對派喉舌習慣「拖建制後腿」，讓市民當作一場戲般看，以求取官能刺激。就連英美政客也看穿了這套伎倆，知道反過來如何利用反對派去加害香港和內地了！

從減排論壇開始，此際應是反對派喉舌作出根本改變，回歸到關心民生大事的時候了！

中國能為中東國家注入新的統治合法性?

國際政治 鄧飛

2016新年肇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來一幕外交大手筆——對中東三個大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展開國事訪問，推動價值幾百億投資，是促進經貿合作的「一帶一路」戰略在中東的落實。更是少有先例地、在臨行之前，先發布一份《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把自己的來意、善意與合作之意先說清楚，充分把握外交上的話語主動權。

相信沒有國人會反對這種既是有所作為、又是互惠互利的中東政策，但與此同時，這種中東政策又的確讓人感到至少有兩點憂慮：一是安全系數：大量的中國投資投放到這個「千年火藥桶」地區，會不會血本無歸？二是美國因素：美國在中東的政策不得人心，助力「阿拉伯之春」把埃及給攪渾了；美與沙特阿拉伯的關係，其實也自小布什政府時期已經開始降溫。今天奧巴馬政府更是明擺着批判沙特執政當局，對伊朗也是恩仇難泯。但畢竟美國在中東無論是政治結盟、經濟操控和軍事存在，已經是深耕易耨了大半個世紀，不可能眼巴巴看着中國人乘虛而入，取而代之成爲中東的主導者。

「一帶一路」與地緣政治衝擊

單靠把錢撒出去的善意，不足以降低投資的政治風險。而中國過去的確也在這方面吃過不少虧。哪裏剛砸錢下去了，哪裏的政治就開始鬧事了，原來簽訂投資合作協議的政權被新的政治力量所動搖了，甚至推翻了，之前的中國投資利益便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如在利比亞、緬甸、泰國等，不一而足。歐美國家那種輸出西方價值觀的「以良治與民主換取援助」（good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in return for aid）的交往模式，當然不符合中國外交的五項基本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然而，如果我們把外交五項原則，簡單地理解為單純經濟層面合作，政治局勢聽之任之的話，那麼過去吃過的虧，可能還會吃，過去交過的學費，可能還要再交。**何況中東局勢遠比東南亞來得複雜，而彼此歷史交往經驗的有限，又讓中國人對此地倍感陌生。

因此，整個的中國中東政策可以概括爲一條問題：我們的外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需要注入什麼新的政策內涵，才足以讓中國在中東的經濟利益，乃至「一帶一路」戰略，能夠經得起中東宗教政治和地緣政治的衝擊？

中東國家的政治似乎總是在兩端之間徘徊：要麼是宗教極端主義，要麼是世俗封建獨裁。近現代的中東歷史發展經驗告訴我們，這兩種力量彼此總是水火不容。在冷戰時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均充分利用中東這兩種政治力量進行代理人戰爭，以利爭霸。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中東國家的宗教極端勢力相對比較薄弱，在泛阿拉伯主義思潮影響之下，埃及、伊拉克、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都建立起自詡爲「正確獨裁主義」（right dictatorship）的政治體制。甚至連拒絕與埃及爲伍的沙特阿拉伯，也實際上是一個封建君主獨裁政體。這種獨裁體制雖然曾一度利用「泛阿拉伯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和進行有限度的現代化建設，來建立統治合法性和民衆認受性，同時對宗教極端主義也有着很強的壓抑作用。但奈何在美蘇冷戰爭霸的大操控格局之下，以及面對以色列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這種世俗獨裁體制不斷地在透支着它的「正確性」。與此同時，宗教極端勢力，又在反抗以色列暴力鎮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反抗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沙特阿拉伯贊助的「瓦哈比（Wahhābiya）」原教旨思想傳播的三重作用之中，羽翼漸豐。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不再需要這些「正確獨裁主義」國家來平衡地緣政治了，反而藉着反恐之名和因應顏色革命的冒起，把這些獨裁體制一個接一個地打掉。結果美式民主仍未見，政治瓦解、社會崩盤卻四處皆是，平白爲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增添了其必需的群衆基礎和社會土壤。沙特阿拉伯雖然沒有遭受顏色革命和美軍入侵，但如上所述，美國政府對與瓦哈比暗通款曲的沙特當局，早就不耐煩了。

簡而言之，中東國家變成兩大類別：

——擁有較強政府能力的國家；其政治體制日益缺乏民衆認受性，如沙特阿拉伯。

——缺乏政府能力的國家；就算它的執政者，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而貌似擁有統治合法性，但也因爲政府能力不足，而推行不了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從而不斷消耗自己的民衆認受性；如埃及等遭受顏色革命衝擊的國家。

兩種國家都不得不面臨宗教極端勢力的衝擊，如果不能有效地提升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認受性，那麼面對宗教極端勢力、民粹主義者的攪局衝擊，就會底氣不足。那麼國家社會崩盤的風險，就不能免除。

「在商言商」更應「在商言政」

中國的中東政策、尤其是針對阿拉伯國家的政策，不僅能讓阿拉伯國家得到經濟發展的機會和實惠，更重要是能爲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國家的現有政治力量，注入新的統治合法性和民衆認受性。從而讓阿拉伯國家現有的管治當局，既能應對宗教極端力量的衝擊，也不必在被迫傳入顏色革命之類的、急進西式民主化過程中，出現政治崩盤和社會瓦解。只有當阿拉伯國家現有的管治當局，獲得了比現在更高的統治合法性和民衆認受性，宗教極端勢力無法再利用貧窮來煽動階級、教派仇恨，親西方勢力無法再利用意識形態來煽動推翻現有管治體制，管治才能獲得可持續性，那麼中國在當地的經貿利益才能獲得長遠的保障。**因此，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中東政策時，不能只是在商言商，且應該在商言政。與每個中東國家所進行的、價值數百億美元的經貿合作，不能只惠及該國統治集團的一小撮人，而是應該通過中阿合作論壇，和經驗交流、文化合作等軟實力溝通平台，鼓勵阿拉伯國家統治當局把中阿經貿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廣泛地惠及民衆，用以消除階級、族群和教派之間的貧富懸殊，**從而使現有的政治體制，通過利益均沾來獲得更大的合法性和認受性。用以消除包括宗教極端思想在內的一切極端思想的社會土壤，讓阿拉伯國家眞正走上可持續的繁榮穩定道路。也只有這樣，中國在中東的投資利益、戰略利益才能眞正獲得可持續的保障。

美國前總統高級顧問帕特·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曾在一月十八日以「伊朗走上了中國道路？」（Is Iran taking the China Road？）爲題撰文，對伊朗以精神領袖爲核心的執政當局，致力對外穩定國際關係、對內發展經濟，以謀求眞正的政權持久性（Iran's regime seems to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path to power and permanence of the regime lies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avoiding conflict–and taking the China road.），表示很大的讚賞。

美國能欣賞伊朗走上中國道路，那麼中國能幫助中東走上中國道路嗎？哪怕只是促使中東進行有限的模仿，也能帶來持久的共贏。

作者為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